

• 人物评传 •

司徒博：推动中国近代牙医学本土化

Situ Bo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Dentistry in Modern China

袁紫玉 /YUAN Ziyu 李树雪 /LI Shuxue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山西太原, 030006)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摘要:司徒博是中国近代牙医学发展的奠基人,通过创办《中华全国齿科医学学报》,编著《齿科医学全书》和《家庭口腔卫生学》,成立中国齿科医学会和中国保牙会,开展口腔卫生运动并开办三所牙医学专科学校等工作与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牙医学的本土化进程。

关键词:司徒博 牙医学 近代中国 本土化

Abstract: Situ Bo is the found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dentistry in modern China. He founded the “Journal of Chinese National Dental Medicine”, edited “Dental Encyclopedia” and “Family of Oral Hygiene”. He l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Dental Association and Chinese Teeth Protection Association, and even advocated a campaign for oral health. What’s more, Mr. Situ established three dental schools. In short, he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dentistry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Situ Bo; Dentistry; Modern China; Loc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920.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1.12.017



司徒博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牙医学的本土化,肇始于西方传教士医师设立传教士大学的牙学系。1908年,英美加在成都筹建华西协和大学,加拿大新教传教会派遣林则(A. W. Lindsay)博士作为第一位入华的牙医学传教士在中国西部展开牙科工作,以此为标志,近代牙医学开始传入我国。^[1]此后,中国的牙医学系相继在一些传教士主办的大学开办,国

内虽有少量的牙科诊所,但设备差、师资少,全面受过牙医学专门训练的医师仅数百人,且多集中于大城市。所以,整个近代中国牙医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尤其欧美、加拿大与日本等国。20世纪初期的西方牙医学体系借以西方医院在中国之实践,通过牙科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刊物、齿科医学会、齿科宣传性组织以及齿科专著等不同形式向民众延伸,改变了牙医的中国传统,推动了中国民间牙医学的发展。司徒博作为早期赴日的牙医学留学生,在中日齿科医学交流、齿科人才教育之培植、口腔卫生之提倡以及齿科学术推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山西省民营科技型企业发展瓶颈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0103)。

收稿日期:2020年3月18日

作者简介:袁紫玉(1992-)女,湖南岳阳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加医学传播史、医学史、科技传播史。Email: yuanziyu_sxu@163.com

李树雪(1968-)男,内蒙古集宁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编史学、科学思想史。Email: Lishuxue@sxu.edu.cn

进等方面,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为中国近代齿科的本土化发展起到了奠基与开创性的作用,对中国近代牙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一、生平与机遇

司徒博(1889-1976),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其父司徒有昂是恩平县有名的旧学塾师,自小便在父亲的教导下接受教育,^①这为其日后接受新式教育打下了基础。从外部环境来讲,自1807年,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首的基督教新教在通商最早的广州和澳门两地传播医学,揭开了近代基督教新教在华医学传教的序幕,其后辐射到更多通商口岸。^[2]到19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医学传教”逐步拉开。这两支力量到20世纪初对广州地区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民众对西医的态度从怀疑到接受乃至认同。1910年之前司徒博的成长经历,据司徒博后人及相关文献已没有详细的记录。但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判断,在晚清新学与旧学交相兴替下,司徒博深受新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这为后期司徒博走向牙医学埋下了伏笔。

认识西医司徒羨文是司徒博人生中走向牙医重要的转折点与机遇。1910年,司徒博在广东开平赤坎圩结识了西医司徒羨文,两人商议在赤坎圩合作开办一间西药房,取名“觉安药房”。药房主要以经营药物为主,随着买药与问诊的不断增多,逐步走向卖药与医疗综合经营。经营过程中牙科疾病问诊的增加以及需要激发了司徒博对牙医学的关注,他开始系统性的到广州、新昌等地学习牙科诊疗技术。两年之后,司徒博扩展了觉安药房的业务,在原有医务的基础上添加了牙医的诊断与治疗。具有牙科诊疗技术的觉安药房发展势头很好,但司徒博并不满足现状,决意到经济水平与医疗技术更为先进的上海发展。^[3]

之所以去上海,是因为受当时地缘政治的影响,20世纪初期的上海是西医人才最为集中的城市。司徒博于1912年在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口537号开办牙科诊所,^[4]后迁址并改名为司徒博牙科医院。适时的中国,牙医学由欧美输入不过四十多年,发展未见明显成效,况且同学科研究者与

医师分布于各地,无法联络。^[5]鉴于此,为了谋求同业之联络感情、学术交流之需求,1919年,司徒博结合其医疗实践在上海创建中华全国齿科医学会,学会编辑发行《临时周报》,后改刊名为《中华全国齿科医学学报》,以应对当时医学交流之要,这也成为了我国最早的牙医学学术期刊,^[6]对后期国内牙医学学术报刊的出现产生引导性的作用。

诊所的发展与学会的运行使司徒博自觉技识不能满足当时的现实需要,为了拓展自身齿科医疗技术知识,司徒博决定赴日本学习齿科技术,并在1922年作为函授班留学生毕业于日本东京齿科学校(后改为东京齿科大学)。1923年司徒博在自己创办的诊所开办了齿科讲习所,开始了他的牙医学传播及本土化实践。^[7]当时国内几乎没有齿科医学专业类书籍,司徒博将日本齿科医学讲义教材译成中文,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编,将改编后的讲义教材用作当时齿科讲习所的讲义进行教授,后影响力逐渐增大,因为参加听讲者日益众多就扩充改办“中国齿科专门学校”日常运行主要是依靠司徒医生私人诊所的业务收入。由于学校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得到了许多教育家与政治家的支持,如,当时的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上海新闻联合会会长戈公振等,对于这一教育方式很重视,皆觉有提供的必要。([3], p.3)

1923年,在多方人士的支持与努力之下,司徒博将齿科讲习所正式改名为中国齿科医学专门学校,设校舍在天道庵路。同年,司徒博创办群众性护牙协会——中国保牙会,保牙会旨在提倡口腔卫生、呼吁民众齿牙卫生健康。当时一些社会名流都积极响应,加入该会以示倡导,并举办了口腔卫生运动大会(图1),时任上海大学校长的于右任、副校长邵力子、戈公振等人都踊跃支持参加,于右任担任运动的“总队长”。同时,中国保牙会还出版《口腔卫生月刊》(图2),由邵力子、戈公振等为编辑。保牙会及《口腔卫生月刊》堪称我国口腔卫生宣传教育之先导,是我国最早的牙医保健宣传机构和刊物。口腔卫生运动大会的举办已不仅仅是在上层的一种宣传活动,更重要的是要向民众普及健康与卫生。

经过几年的实践之后,发现中国齿科医学专业书籍很缺乏,致使一些有志牙医学事业的人士无

①司徒氏春秀祖族谱[Z].司徒博之孙司徒贤提供,2008,107.

法得到专业的知识学习，于是司徒博决定创办中国齿科医学书局，从事医学专著之出版，以满足现实之需。1929年，司徒博编纂出版《齿科医学全书》，内容吸收各国齿科医学先进知识及日本学习之讲义，同时添加了自入行以来司徒博行医之技识。



图1 口腔卫生运动大会宣传报



图2 口腔卫生月刊

医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使司徒博的牙科诊所规模逐渐扩大，30年代初更名为司徒博牙科医院，并由爱文义路迁霞飞路342号。其时的设备更为先进完备，当地的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如段祺瑞、叶楚伦、胡汉民等元老都在他的医院诊疗，并与司徒博医生交友甚多，当时开封当局大多军政要员也常电邀司徒博治牙。^[8]1932年，为了普及牙医学常识使大众受惠，同时纪念司徒博的牙科医院开业20周年，司徒博印发《家庭口腔卫生学》一书，将日常齿牙疾病，细菌生长环境，洗刷齿牙之法，幼儿牙齿卫生，饮食健康与洗漱卫生等逐一归入书中，成为了中国近代早期普及常识的

牙医学卫生书籍。^[9]这种牙医学普及与推广的方式，正是近代牙医学本土化的最快途径，也为后期的牙医学实践奠定了基础。

1937年上海沦陷后，大部分地区处于敌伪统治之下，只剩下上海租界这一“孤岛”，在这样的情况下，司徒博依旧在为牙医学事业发展贡献力量。1939年，司徒博医生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牙科医学会。学会属于学术性讨论组织，交流牙医学方面的新信息、新知识和新技术，采取能者为师的方式轮流主讲，这样的学术演讲会约举办了两年。^[10]同时，司徒博仍未放弃开办牙医学院校培养专业人才的心愿，于是筹划开始第二次办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学校立案碰到了难题，为了不与敌伪政府发生关系，这次筹办工作是在中国牙科学会的基础上进行的，学校改办为夜校，夜校共招收了两届学生，到1945年第二届学员毕业，抗战胜利，夜校停办。1946年，司徒博创办了上海牙医专科学校，上海牙专从1946年到1950年共招收五届学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根据华东高教处指令，上海大专院校院系进行调整，司徒博开设的上海牙医专科学校并入震旦大学医学院牙学系。其中48、49、50班30余位学生因院系调整毕业于震旦医学院牙医系。1952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院系调整，由原震旦牙科与司徒博牙医学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①1956年5月，司徒博怀抱建设祖国的理想，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将创办的牙科医院迁往兰州，组建甘肃省牙病防治所，^[11]举家支援建设大西北，在西北牙医学事业发展中贡献力量，度过了晚年的岁月。^[12]

二、对牙医学传播的贡献

在司徒博以及同仁的努力下，中国的牙科医学通过牙科医学会、牙科医学相关专门刊物、牙科宣传性组织以及牙科专著等不同形式的传播得到了快速发展，致使20世纪的30年代及后期成为中国牙科传播的主流阵地。只是当时创办的期刊虽多，却因时值抗战期间，局势动荡，经费短缺，大部分期刊少则出刊4-5期，多则出刊40-50期，

①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1903年-1952年大事记[Z].司徒博之孙司徒贤提供,2007.

后均相继停刊,^[13]但其影响力非常大。民国时期我国出版发行的牙医学期刊10余种,有些刊物甚至成为培训牙医用的教材。^[14]在这些期刊中,司徒博创办的期刊有三种,即1919年之《中华全国齿科医学学报》、1923年之《口腔卫生月刊》与1931年之《中国齿科月报》。

1. 牙医学学术期刊的创办

1919年,为汇集齿科同业学术并推进卫生事业发展,司徒博在上海创建“中华全国齿科医学会”。由于当时中国齿科医学是起步阶段,虽由欧美输入已40多年,但发展缓慢,并未取得明显进步,全国从事牙医学同业仅千余人,又分布于珠江扬子江黄河以外,鉴于当时的通讯受限,学术交流困难,所以牙医学的整体水平难以快速提高。司徒博虽面临各种困难,不失牙医学惠及大众的信念,创建了齿科医学会,谋求各方同业共谋牙医学并且联络技识。在召开第一次齿科医学会时,司徒博在开幕词中提出齿科医学同仁应有的专业功底与学会的主要工作:“关于个人当交际诚实也。言辞得体也。器具清洁也。作工夫不苟且也。外此则求所以扩张会务。破除成见。招募会员。鼓吹分会。翻译书籍。发刊医报。合全国同业之精神。阐扬牙科学理。以全国同业之资本。制造牙粉原料。全国同业。”^[5]齿科医学会成立后,随即编辑发行《中华全国齿科医学会临时周报》,(图3,图右上角文字为孙迭民1987年标注“这一份刊物是我国解放前的口腔医学期刊中出版最早的一份,时为1919年,共计出四期,目前发现第三、四两期,存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作为实行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之主阵地,因未经学会讨论通过,故定名为临时。《中华全国齿科医学会临时周报》出至



图3 中华全国齿科医学会临时周报

第四期时,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于是经全体职员会议讨论通过,依照会章规定编印为正规学报,即发印《中华全国齿科医学学报》。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牙医学学术期刊,因而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中国近代牙医学本土化的里程碑。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牙医学学术期刊,《临时周报》不仅成为同行间传播牙医学技识的工具,同时也记录了中国近代牙医学器具与卫生用品的发展状况,为推动中国近代牙医学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除《临时周报》外,受当时稿件、学术交流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国内的牙医学期刊很少能够定期出版。到1931年,除1927年创刊的《南满洲齿科医学会杂志》能定期发行外,还没有一本正规、定期出版的学术期刊。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牙医学建设,司徒博毅然创办《中国齿科月报》,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以月刊形式发行的牙医学期刊。司徒博在发刊词中描述了中国牙医学发展的情况,以及亟需创建传播技识与交流学术的期刊的重要性:

夫以偌大之国家,人口较东邻六倍有奇,齿科医学之输入,有五十余年之历史,至今同业数千,留学归来者,亦大有人在,乃除民国三年曾由已故之刘东生君暨国内同业发起中国牙医学会时有月刊杂志之印行外,是后竟无可称完备相继刊行之任何刊物,至今欲觅一年刊,尚不可得,遑论月刊,现状如此,欲使我国齿科医学不日归淘汰者岁希。……本学术兴替匹夫有责之义,爰不揣学识之简陋,进行之困难,毅然刊印本报,以应时势之急需。([8], pp.1-2)

《中国齿科月报》面对当时的情形着重于解决中国近代牙医学本土技识传播的问题,后期的办刊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努力的。其一,世界各国齿科医学学会及会议开展动态与消息的发布,月报刊发了各国齿科大会与活动,如第八次万国齿科医学大会、^[15]第二次万国齿科矫正学会、^[16]第七次齿科用器械材料展览会概况、^[16]第一次万国口腔病学会介绍、^[17]在欧之美国齿科医学会等各国牙医学发展概况等;^[17]其二,齿科医疗技术的详细实验与操作方法的说明;如当时的齿牙材料、镶嵌法技术等,都是对外文进行直接翻译刊发,这对于当时材料的更新与医疗技术的改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三,世界各国牙科医学发展的情况与我国牙医学发展的总结与反思,如日本牙医人数统计、^[16]苏

联政府下的牙科状况、^[17]德国齿科学生之概况等。这些统计内容都是中国牙医学统计首创性的。《中国齿科月报》记录了适时中国齿科医学书局首次对中国全国牙医人数进行统计的事件，^[18]并对全国各地牙医人数进行公布。同时，对中国齿科医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分析中国齿科事业进步迟缓的原因，以此推进加快中国近代齿科学术和宣传口腔卫生的团体、齿科专门学校、齿科出版物的建设并提出今后发展齿科医学的展望。^[19]

《中国齿科月报》由司徒博任总编辑，无论是专业性内容，还是在介绍各国齿科事业与推进中国本土牙医学事业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与指南作用，是中国近代牙医学本土化以“月刊”形式的早期尝试。由于办刊目标明确，在《中国齿科月报》发行以后的几年时间内，产生了积极的带动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其他一些地区对牙医学的重视与发展，尤其是上海牙医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始涌现出来。

2. 牙医学著作的编著

经过首次办学实践之后，司徒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处于齿科医学专业书籍缺乏的状况，发现社会人士对于齿科医学尚无深切的认识，而有志研究齿科医学者，却没有相关书籍参考。于是司徒博决定创办中国齿科医学书局，主要从事齿科医学专著的编印，以应社会之需要。^[20]1929年，司徒博编著的《齿科医学全书》出版，全书共四集，第一集由胎生、组织、解剖、生理和齿科解剖图解组成，^[21]第二集由治疗、充填、矫正和保存疗法图解组成，^[22]第三集由细菌、病理、口腔外科、药物组成，^[23]第四集由材料、技工、继续与架工等组成。^[24]书籍自出版之后，行销全国及南洋各岛，使众多从事牙科事业的人得到了有益于进修及自学的系统教材。

《齿科医学全书》得到当时许多医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的支持。其书名由国民政府立法院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题词，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为其书内封，国府委员徐谦题“集齿科之大全”之字，中华民国首任行政院长谭延闿题词“食饭不忘”，欧美卫生考察专使诸民谊称赞到：“司徒博君齿科专家发展宏图编撰此书，达百万余言，其于学理之探讨，医药之研求，治疗之方法，皆至详尽，为吾国齿科医学放一异彩，足以辅救浅学之士，而起患者之诊疗，是诚吾国牙医之南针，齿疾之福音

也。”（[21]，pp.1-9）

因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司徒博主编的《齿科医学全书》分别于1932年和1940年两次增订再版。由于处于战争动乱的年代，当时中国牙医学的发展极其缓慢，一些学校所设专业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医院的科室也不是很正规、健全，但是司徒博编撰的《齿科医学全书》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的牙医学专业书籍，在当时产生了奠基性作用，其影响力很大。到现当代，许多口腔史类书籍将司徒博《齿科医学全书》认定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民间齿科医学书籍。

除《齿科医学全书》外，鉴于中国近代民间大众对牙医卫生无从了解与普及。1932年，值司徒博牙科医院二十周年纪念之际印行纪念特刊，编撰《家庭口腔卫生学》一书，以作口腔卫生宣传之先导，适时蔡元培、林森、段祺瑞、许世英、邵力子等众多政治要员纷纷予以赞扬。（[9]，pp.1-18）《家庭口腔卫生学》一书从专业书籍转向民众宣传类普及常识书籍，将日常齿牙疾病（龋齿，齿槽脓漏等），细菌生长环境，洗刷齿牙之法，幼儿牙齿卫生，饮食健康与洗漱卫生等逐一归入书中，成为了中国近代早期本土性普及常识的牙医学卫生书籍。

三、中日齿科医学交流

民国二十四年夏，为改变中国与欧美及日本诸国牙医学发展差距的状况，推进中国齿科事业发展，司徒博向国民政府建议赴日本进行全方位考察。接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的命令（图4）后，司徒博赴日本考察牙医事业，随行者还有三人，分别是上海市牙医公会执行委员孙夏民、嚴大之，以及牙医师黄仁德。^[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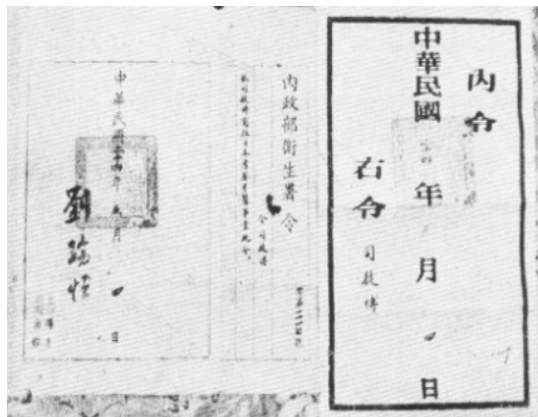


图4 中华国内政部卫生署派遣令

司徒博一行赴日考察,旨在改进中国齿科事业,以他国作为参考,加速中国牙医学的本土化进程。赴日本期间,司徒博与随行三人考查了十四余所日本齿科学校以及含齿科类医院,包括东京齿专,日本齿专,东京高等齿专,日本大学齿专,东洋女子齿专,大阪齿专,京北齿专。医院及医学部包括帝大医学部,红十字会医院,铁道病院,警察病院,海军病院,三乐病院等之齿科部,以及传染病研究所等。^[26]通过考察,司徒博一行对日本牙科的发展状况、发展水平等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这为后期他的牙医学传播与普遍提供了参照系。

除了对学校以及医院部门等实体性的齿科医学考察,司徒博等人与日本不同官员也进行了交往会晤,包括内务省,文部省,东京市政府,教育局,卫生局等,当时的日本文部大臣松田源治题诗赠予考察团,内书“拜将大命任文教,奉告神前致玉诚。我国精华忠与孝,发扬师道答休明。”([20], p.22)同时,对来访考察人员表示欢迎前来的团体有日本齿科医师会,东京齿科医师会,日本齿科学会,大阪齿科医学会,暨各齿科专校等。并在六月四日,共同参与日本齿医界与军政界全国总动员办理之龋齿预防日,有滨町公园之齿磨教练,体育大会,日比谷公园之儿童龋齿预防会,昭和忍冈原田三小学校之龋齿预防会,日本齿科医师会所主办之锦系堀公园内之本所公会堂,浅草公会堂等之龋齿预防宣传会。^[27]

司徒博总结在日考察所得,共十七项:日本齿科医学小史、日本齿科医学教育、空腔术生教育、政府对于公众空腔术生之提倡与设施、学校齿科术生、陆海军之齿科医学的设施、刑务所之齿科的设施、齿科医事术生行政与法规、齿科医学概况、日本齿科医师概况、齿科医师会概况、日本齿科医师会标准酬报规定、齿科医学团体、齿科医学的刊物与书籍、齿科材料制造业概况、龋齿预防日、最近齿科医学之趋向。([20], pp.18-19)返国后,司徒博将考察所得,分别呈报政府,并附发展我国齿科医学事业与推行口腔术生计划,计十九册,共六万余言。

在考察日本齿科医学事业的过程中,司徒博等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牙医学发展的不足以及与欧美、日本各国的发展差距。同行者巖大之感叹中国牙医学发展中经费、人才、改革等等问题:

观夫日本的齿科现状和过去的奋斗,回想吾国齿科事业之发轫亦远在数十年前,其中不乏有志之士努力于齿科事业暨学校之创立,惟每限于经费,简于设备,而不克终其所成,迄今对于齿科人才的产生,实感缺乏,时一般所期望于欧美回来的齿科留学生为数也不谓少,为时也不谓暂可是除了所谓考试牙医镶牙委员会外,迄未闻有关于整个齿科之立场上的改革,及提高有关齿科的一切计划,与齿科医学书籍课本的介绍,和口腔术生宣传运动的推进。^[28]

赴日考察齿科医学事件在当时中国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国内的《中华医史杂志(上海)》、《齿科季刊》等刊物都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宣传与肯定,日本齿科新闻报六月二十五日版面四也发表了题为《友邦特派员齿科亲善使节司徒博大阪登陆第一步的欢迎视察会》的报告。^[29]1935年《齿科季刊》的第1卷第2期描述了司徒博氏奉派考察日本齿科事件:“牙医司徒博氏,广东籍在沪开业已二十余年,过去经办牙种事业屡见不鲜,近由国民政府卫生署派往日本考察齿科医学事业,同行者尚有上海市牙医公会常委孙夏民氏大之氏及本刊发行人黄仁德氏云。”^[30]1935年《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特派第21卷第8期国外消息专栏刊发题为“司徒博奉派赴日考察牙医事业”的消息:“司徒博奉派赴日考察牙医事业,前中国齿科专门学校校长司徒博于五月间奉卫生署令,派赴日本考察牙医事业。邀上海市牙医公会执委孙夏民,黄仁德,巖大之三人同行。归国后整理考察所得,呈报十八册。”^[25]1935年《齿科季刊》第1卷第3期描述了牙医司徒博氏赴京报告考察牙医经过:“牙医司徒博氏等,将奉内政部卫生署令考察日本牙医事业,归国后即整理呈报事件,兹已告竣,已于前月晋京呈报,闻内容有考察经过情形一册,考察各方之学呈报十八册,及发展吾国齿科医学教育及口腔卫生事业之计划一册,交长六万余字,与有关上项事业之刊物及掛图表九百余种,已一并呈送卫生署。”^[31]

赴日考察齿科医学坚定了一行人推进中国牙医学事业的决心,归国后,更加投身于中国牙医学发展建设之中,积极推进举办齿牙病理变化之展览会,组办齿科学术演讲会,在期刊中增加关于世界齿科医学之译文介绍,及同业之经验著作

之讨论等。([28], p.34) 司徒博考察日本的齿科事业发展, 从中国和日本的相关报道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影响, 对于中日齿科医学交流, 特别是对推进中国当时齿科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牙医学教育与人才培植

西医东渐背景下的中国牙医学学科的设立与人才培植, 一直以传教士开设的大学为主导, 后经司徒博等一批批仁人志士通过创办学校、期刊、学会、学校等多种形式, 推动了其本土化进程, 实现了牙医学传播、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自1923年到1946年, 司徒博在困境中先后创办了3所牙医学专门学校, 并培养了一批牙医学人才, 成为后来牙医学的中流砥柱。这3所学校是分别是1923年创办的中国齿科专门学校, 1941年创办的中国牙科医学夜校, 以及1946年创办的上海牙医专科学校, 解放前私人开设的牙科医学校只有上海司徒博氏所创办的上海牙医专科学校一所。^[34]

1. 中国齿科专门学校的创建

1923年司徒博借在虹口自设的诊所创办了齿科讲习所, 旨在向民众传播齿科医学知识, 推广齿科医学及口腔卫生之事业。讲习所创办之初只有几个学生, 不久因为参加听讲者日益众多就扩充改办成为“中国齿科专门学校”, 校址也迁到了江西路桥脚。司徒博曾就此描述了创办中国齿科医学专门学校之经过:

我国齿科医学及口腔卫生之事业, 如草始萌, 方长未艾, 故为推进计, 自以培植人才为急务。故先有齿科讲习所之设, 嗣因来学者日众, 乃扩充为中国齿科医学专门学校, 延请医学界与齿科专家分任讲授。并创办平民牙科医院, 为民众服务, 兼供学生实习。今毕业生之服务于社会而具有声誉者, 颇不乏人。惟学校以棉力有限, 并乏教授人才, 未能继续进行, 甚为可惜。但齿科教育, 素志所在, 他日若有机会, 仍当一本初衷, 再行努力焉。([20], pp.12-13)

非常遗憾的是学校“棉力有限, 并乏教授人才, 未能继续进行”。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当时司徒博的无奈与困境, 但这使他认识到不寻求政府及社会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行的。此前中国齿科医学专门

学校办学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司徒医生私人诊所的业务收入, 师资是除他本人自任教师外, 还聘请的两位留美医师, 所以经费与师资都不足。于是终因学校经济力量薄弱、师资不足等原因, 只办了两期即告结束, 但这两期的毕业生服务于社会后, 具有声誉者颇不乏人。([10], p.186)

2. 中国牙科医学夜校的创建

虽然第一次办学因经费与师资原因结束, 但司徒博一心投入中国牙医学教育事业的决心没有变。1939年, 司徒博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牙科医学会, 决心汲取社会同业的力量。医学会参加者大多是他以前的学生, 学会纯属学术性的组织, 每月在医院内聚会一次, 做一些牙医学相关学术演讲, 以求交流牙科方面的新信息、新知识和新技术。医学会采取能者为师的方式轮流主讲, 经过两年的活动, 初见成效, 社会效应明显, 1941年, 司徒博觉得再次办学的条件基本成熟, 他开始筹划第二次办学——创办中国牙科医学学校。这一想法正如他所述: “博也不才, 三十年来, 除执行牙医职业外, 固无时不思有以发展吾国牙科医学教育, 前曾创办中国齿科医学专门学校, 毕业学生有若干人, 旋以他故中辍, 今幸诸同工之协助, 得以再度创办中国牙科医学夜校, 成败利钝, 虽非所逆视, 但以素志所在, 本基督乃役于人之精神, 不能不有所努力耳。”^[33]

这次办学的筹备工作是在中国牙科医学会的基础上进行的, 成立校董事会。建校经费由司徒博承担了大部分, 其余不足部分由校董会实行认捐。这种形式正是社会力量办学的有效形式, 这与他第一次办学已有很大区别。校董会成员有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医学博士王完白、刁信德等, 这些人在当时可以说是社会的名流, 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时不凑巧,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进占租界要求所有办学立案必须向敌伪政府申办。因此筹备工作虽称顺利, 但在向政府立案问题上碰到了难题, 为了不与敌伪政府发生关系而低头立案, 经过校董会研究决定改办为夜校, 因为办夜校是无须立案的, 校名也改为“中国牙科医学夜校”。([9], p.186)

中国牙科医学夜校, 仍是以司徒博为主导, 开设的初衷没变, 旨在培养牙科人才, 发展中国牙医学事业, 加快牙医学事业的本土化进程。这

一次办学司徒博通过单位牙医学从业人数的对比来刺激大众投入到这一行业的学习中。所以,司徒博结合自己对当时世界各国牙医师人数与中国人数的对比,启发民众及业内人士“故牙医学校之开设,牙科人才之增多,适足以社会人士之对于牙科事业愈加认识与信仰,对同业不惟无损,而且有益,想牙科同业不乏明达之事,当不以斯言为河汉也。”([33], pp.1-2)

司徒博的这种认识,极大地激发了当时的学医热情,同时也提高了对入学者的资格审查。中国牙科医学夜校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为三年,师资大都为在日本留过学的牙科医师。课程设置齐全,每届最后一年为临床实习,在司徒博牙医院专辟门诊部作为学生实习基地。([9], p.186)夜校招收过两届学生,1945年第二届学员毕业,适时正值抗战胜利,因此夜校停办。

3. 上海牙医专科学校的创建

1946年,司徒博开始他第三次办学实践,结合前两次的办学经验,他向南京政府教育部提交报告,筹建四年制的牙医专科学校,其思想已由自己独立办学、社会力量办学,发展到了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办学相结合,这是牙医学事业发展的本土化基底上的正规化。1947年七月司徒博呈准教育部立案,参照部颁教育法规组织,并定学校名为“上海牙医专科学校”,同年九月二十九日成立开课。^[34]司徒博将自己的私宅,坐落在复兴西路40号的一幢花园洋房以及江湾五角场的一块地皮捐出来作为校舍和附属医院之用,同时向外界包括南洋侨胞募集资金,成立了校董会,自任校长。

1948年《申报》对该校这样描述:“上海牙医专科学校系牙医师司徒博于卅五年七月经教育部核准后开办者,现有一年级学生37人,二年级学生18人,该校现校址系司徒校长私邸,以屋宇不敷应用,拟在江湾两江体专旁之基地上筹建新校舍。又该校名誉校长为于右任、孙科、戴季陶、王宠惠、邵力子等九人,董事长为潘公展,校董为吴蕴初、刁信德、李汉泽等九人,修业年限为四年。”^[35]同年8月,台湾《齿科医学》杂志报道:“全国公私立医学教育机关共有44所,其中私立医学专科的牙科仅有上海牙医专科学校一所。”([9], p.187)

基于此前的两次办学,司徒博对于这所学校的

建设完全是按当时西方牙医学的正规学校建制的,当时组织机构相当健全:有校董会,会计室,医务会;附设医院含医务组,药剂材料组,事务组。教科处含注册组,出版组,图书馆;总务处含文书组,庶务组,出纳组;训导处含生活管理组,课外活动组,体育术生组等。^[36]而且,学校课程多取英美德日等国牙科医学之所长,订有系统之学科。四年学制,第一年学一般基础科学与基本医学理论并实习;第二年学牙科医学之基本伦理并实习;第三年学牙科临床理论;第四年临床实习。学校设备也较为齐全,校中并有标本模型设备,又有化学实习室,显微镜组织实习室,补缀实习室,人体解剖室等。教授共有二十九人,均博士学士辈,为时下硕彦人材,学生有数百人,以“精勤忠爱”为校训。([34], p.32)上海牙专的招生工作在全国展开,在广州等地都设有招生办事处,深得社会人士好评,^[37]自1946至1950年共招收五班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不少人在口腔医学临床、教学、科研等各领域工作中起着骨干作用。1950年上海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时上海牙专并入震旦大学。

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牙医学人才培养的局面虽有所改观,但牙医学教育仍未能普及,年近60岁的司徒博依旧心系中国牙医学教育的发展:

我国牙医教育,虽已有二十余年历史,学校亦有数所,但迄今毕业人数不过二百人之间,连同自外国学成归来,及有技术而无学历,政府准予登记开业者总数亦不过五百人左右:以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之国家,牙医人数竟少至这样地步,如以人口比例计算。平均一百万人以上,始有牙医师一人,且实际有许多偏僻的地方,根本还没有牙医的踪迹。……吾人由客观环境观察,迄今未有若何进步!似此素质,何能在此大时代中担负起确保国民健康的责任?况国人之习惯,素不重视齿牙之疾病!^[38]

结 语

从最初作为一名西医影响下的本土医师,到后期成为中国近代牙医学本土化发展的推动者,司徒博对中国本土牙医学事业的发展影响巨大。他在中国近代牙医学期刊、著作、医院以及教育上所做的每一步努力,是出于他对中国牙医学发

展的热情与执着,是为表一颗爱国之心。他所付诸的每一滴汗水都积极推进了中国近代牙医学卫生及教育事业,其贡献是奠基与突破性的,对后期的牙医学发展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 [1] Life Sketches of Lindsay.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West China' [Z]. 1907, Canada.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78.096C.20 of 20.
- [2] 潘荣华、杨芳. 晚清医学传教的空间转换与现代传播工具的崛起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 27 (10): 93-99.
- [3] 司徒学. 一生简述 [M]. 1956, 手稿本.
- [4] 郑麟蕃、吴少鹏、李辉葵. 中国口腔医学发展史 [M]. 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1998, 45.
- [5] 司徒博. 中华全国齿科医学会临时周报 [N]. 1910-11-09 (2).
- [6] 李刚、滕洪安、张治. 中国口腔医学史 (年表) [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26.
- [7] 中国最早的口腔医学教育家之一司徒博医生 [J]. 临床口腔医学杂志, 1987, 3 (4): 235.
- [8] 司徒博. 赴开封为军政诸公治牙追记 [J]. 中国齿科月报, 1931, 1 (2): 42-43.
- [9] 司徒博. 家庭口腔卫生学 [M]. 上海: 上海人文印书馆, 1932.
- [10] 孙迭民. 记我国口腔医学教育家的先行者司徒博先生·卢湾史话 [M]. 上海: 卢湾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2.
- [11] 司徒博档案. 上海市卫生局关于司徒博赴兰州文件 [Z]. 1956, 上海: 上海市档案馆, 档案号: B242-1-908-46.
- [12] 司徒博档案. 上海市卫生局便签 [Z]. 1956, 上海: 上海市档案馆, 档案号: B242-1-908-46.
- [13] 袁璐、李刚、于洁、刘青. 我国近代牙医学期刊的建立与发展 [J].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2009, 30 (24): 3178-3179.
- [14] 周大成. 中国口腔医学史考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191-200.
- [15] 第八次万国齿科医学大会定八月在法京举行 [J]. 中国齿科月报, 1931, 1 (1): 49.
- [16] 第二次万国齿科矫正学会 [J]. 中国齿科月报, 1931, 1 (2): 43.
- [17] 第一次万国口腔病学会概况 [J]. 中国齿科月报, 1931, 1 (3): 43.
- [18] 我国牙医人数之统计 [J]. 中国齿科月报, 1931, 1 (2): 42.
- [19] 黄階泰. 中国齿科事业进步迟缓的原因 [J]. 中国齿科月报, 1931, 1 (3): 3-6.
- [20] 司徒博、司徒学. 口腔疾病与齿牙卫生 [M]. 上海: 中国齿科医学书局, 1935.
- [21] 司徒博. 齿科医学全书第一集 [M]. 上海: 中国齿科医学书局, 1929.
- [22] 司徒博. 齿科医学全书第二集 [M]. 上海: 中国齿科医学书局, 1929.
- [23] 司徒博. 齿科医学全书第三集 [M]. 上海: 中国齿科医学书局, 1929.
- [24] 司徒博. 齿科医学全书第四集 [M]. 上海: 中国齿科医学书局, 1929.
- [25] 司徒博奉派赴日考察牙医事业 [J]. 中华医学杂志 (上海), 1935, 21 (8): 943.
- [26] 孙夏民. 考察日本牙医事业记略 [J]. 上海市牙医公会月报, 1935, 1 (5): 37-38.
- [27] 孙夏民. 考察日本牙医事业记略 (续) [J]. 上海市牙医公会月报, 1935, 1 (9): 72.
- [28] 嚴大之. 视察日本齿科事业后之感想 [J]. 上海牙医公会月报, 1936, 1 (5): 33.
- [29] 友邦支那特派の齒科親善使節大阪で上陸第一步の歡迎會斯界視察の司徒博氏 [N]. 日本齿科新闻, 昭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
- [30] 司徒博氏奉派考察日本齿科 [J]. 齿科季刊, 1935, 1 (2): 29.
- [31] 牙医司徒博氏赴京报告考察牙医经过 [J]. 齿科季刊, 1935, 1 (3): 42.
- [32] 郑麟蕃. 口齿疾病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
- [33] 司徒博. 中国牙科医学夜校开学感言 [J]. 中国牙科月刊, 1941, 3 (2): 1-2.
- [34] 霍鹿珍. 记上海牙医专科学校 [J]. 牙科讲座汇集, 1947, 2: 32.
- [35] 上海牙医专科学校概况 [N]. 申报, 1948-07-02 (2).
- [36] 上海牙医专科学校档案. 上海牙专沿革及校董会 [Z]. 上海市档案馆, 档案号: B1-1-2185-20.
- [37] 上海牙医专科学校在穗招生 [J]. 广州市牙医公会月刊, 1947, (7): 11.
- [38] 司徒博. 发展我国牙科医学教育刍议 [J]. 牙科讲座汇集, 1947, (2): 32.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